

原著者：〔苏〕尼·谢·赫鲁晓夫〔意〕维·维达利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 苏共“二十大”日记

译者：王德树等

133

華夏出版社

1515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苏共“二十大”日记

[苏]尼·谢·赫鲁晓夫 著
[意]维·维达利
王德树 等译

华夏出版社
1989年·北京

DIARY OF THE TWENTIE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Vittorio Vidali

Lawrence Hill & Co., Westport, Connecticut,
USA, 1984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根据1956年6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英译文译出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苏共“二十大”日记

〔苏〕尼·谢·赫鲁晓夫 著
〔意〕维·维达利
王德树 等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铁道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8.875印张 208千字
196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0册

ISBN 7-80053-305-3/D·038

定价：2.75元

出版说明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度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极大的动荡，但也给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冲开了从斯大林主义模式的死胡同里跨出来的大豁口。事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世界社会主义进程经历过曲折和反复，已开始全面进入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回顾当年的事态和得失，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大有必要的。因此，本书收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意共中央委员维·维达利当年出席苏共“二十大”和继后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国际会议的两部日记，以及他对苏共“二十大”的反思及其作为附录而收入的两个历史文件(请参阅本书目录)，可以从不同的几个方面向研究者提供比较丰富的感性材料。

另外，日记的作者出生于的里雅斯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入党。曾在意大利和德国从事反法西斯活动而多次被捕。一九二三年非法进入美国，一九二七年因“颠覆活动”被驱逐出境，流亡欧洲和苏联。一九三八年在西班牙保卫马德里战斗中负重伤，此后在墨西哥度过最后十年流亡生活。一九四九年回欧洲后，成为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共产党领导人。本书中的两部日记都是在该党一九五八年重新加入意大利共产党(请参阅作者注释)之前写的。日记中除描写他本人对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化的惊人之举产生的感触以外，也揭示了他的苏联朋友和其他国家共产党友人所表现的内心冲突和思想反应。而有关这些人物的简介在书末可以查到。

目 录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一九五六年二月）.....	(67)
对苏共二十大的思考（一九五六年七月）.....	(181)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	(190)
结束语.....	(221)
我们党的政治组织（陶里亚蒂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 会议上的讲话）.....	(231)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致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 遗孀的信.....	(244)
作者注释.....	(250)
人物简介.....	(252)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根据一九五六年六月四日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译文)

同志们！在党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中，在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的发言中，以及在过去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对个人崇拜及其有害的后果已经讲了很多。

斯大林逝世以后，党中央委员会便开始执行一项开导性的政策，就是要简明扼要地和彻底地阐明：吹捧某一个人，把他当成具有神人般超凡出众特性的超人，是不允许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的。这种人往往被想象为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的人思考，会办好任何事情，他的行为没有一点错误。

许多年来，我们对一个人的信念，具体地说，对斯大林的信念，便是这样被培植起来的。

这个报告的目的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作全面的评价。斯大林的功绩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有足够数量的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著作讲过了。斯大林在准备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每个人对此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此刻要谈的问题，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是极为重要的，即关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如何逐步发展起来的，这种个人崇拜到某一特殊阶段竟成为一系列极其严重地违反党的原则、违反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充分认识到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以及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个人独揽大权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所以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把与这个问题有关材料让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知道是绝对必要的。

首先请允许我提醒大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是怎样严厉谴责个人崇拜的各种表现的。马克思在致德国工人政治家威廉·布洛斯的一封信中说：“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后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①

后来恩格斯写道：“马克思和我都从来反对为个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除非这样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生前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②

革命的天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极为谦虚是闻名的。列宁总是强调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强调党作为一个生气勃勃的、具有创造力的机体的指导和组织作用，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工人阶级的领袖在指导革命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列宁在肯定群众领袖和组织者的作用有极大重要意义的同时，无情地痛斥了个人崇拜的各种表现，毫不宽容地反对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关于“英雄”与“群氓”的观点，反对把“英雄”同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9页。

② 同上书，第22卷第309页。

众和人民对立起来的一切努力。

列宁教导说，党的力量靠的是与群众牢不可破的团结，靠的是有人民群众——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紧跟着党这一事实。列宁说：“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源泉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①

列宁曾自豪地说，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是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他要求把一切最重要的问题提请有见识的工人提意见，提请他们的党提意见；他说：“我们相信党，我们把党看作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②

列宁坚决反对旨在缩小和削弱党在苏维埃国家组织中的指导作用的各种企图。他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指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强调党实行领导的指导原则是党的集体性。早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列宁就把党中央委员会称为一个领导者的集体，称为党的原则的捍卫者和解释者。列宁指出：“在两届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中央委员会捍卫和解释党的原则。”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强调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及其权威的时候指出：“我们中央委员会本身就是一个高度集中和拥有高度权威的集团……”

列宁在世时，党中央委员会真正体现了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列宁是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他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却从未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他的共事者。他力图说服人，耐心地向别人解释自己的看法。列宁总是孜孜不倦地注意党的生活准则的实现，党的章程的执行，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定期举行。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73页。

② 同上书，第25卷第251页。

弗·伊·列宁除了对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胜利，对我们党的胜利，对把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运用到生活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外，他的敏锐的头脑还表现在他及时地觉察到斯大林身上那些后来造成严重后果的消极的品质。弗·伊·列宁在担心党和苏维埃国家未来的命运时，对斯大林的品质作了完全正确的说明，指出必须考虑把斯大林从总书记位置上调开的问题，因为斯大林太粗暴，对待同志没有正确的态度，他任性和滥用手权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致党代表大会的信中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①

这封信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政治文件，在党的历史上以列宁的“遗嘱”著称，已经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中间散发。你们都读过了，而且无疑会不止一次地读它。你们也许考虑过列宁这些直率的话语，这番话体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对未来党的政策方向的担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②

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知道列宁的这份文件，并讨论了把斯大林调开总书记职位的问题。代表们宣布他们赞成保留斯大林总书记的职位，希望他能注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批评，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7页。

② 同上书，第618页。

并能够克服那些引起列宁严重担心的缺点。

同志们！党代表大会应该知道两份新的文件，这两份文件证实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其“遗嘱”中已经勾划出的斯大林的品质。这两份文件一份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致当时的政治局首脑加米涅夫的信，另一份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致斯大林的亲笔信。

现在，我念一下这两份文件：

列甫·波利索维奇：

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大发雷霆。我入党不是一天了。三十年来没有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鲁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事业，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同伊里奇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什么，我比任何医生都更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这无论如何也比斯大林清楚。我要求助于弗·伊的更为亲密的同志你和格里哥里，请求你们保护我，不要让人粗暴地干涉我的私人生活，不受无端的辱骂和威胁。斯大林以为可以用监察委员会来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将作出意见一致的决定，但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闹这种无谓的纠纷。我是一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娜·克鲁普斯卡娅^①

娜捷施达·克鲁普斯卡娅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写这封信的。二个半月以后，一九二三年三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寄给了斯大林下面这封信：

^① 参见《列宁文稿》第10卷第610页。

弗·伊·列宁致斯大林同志的信（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的妻子接电话，并且辱骂了她。虽然她已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过的话，但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儿知道了这件事。我无意就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自明，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因此，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请您仔细斟酌。〔大厅内一片骚动〕

致敬

列 宁

一九二三年三月五日①

同志们！我不想评论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本身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问题。既然列宁在世时，斯大林竟能够采取这种态度，能够这样地对待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这位党十分了解并且评价很高的、列宁的忠实朋友和我党创建时起就为其事业积极奋斗的战士，那么我们便不难想象斯大林是怎样对待其他人的。他的这些不良品质有增无已，而近几年来已具有绝对不能容忍的性质。

后来的事件证明，列宁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列宁逝世后的初期，斯大林还注意他的〔即列宁的〕忠告，但是后来就开始无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严重告诫了。

当我们分析斯大林指导党和国家的实践的时候，当我们冷静

① 参见《列宁文稿》第10卷，第314页。

下来考虑斯大林的一切所作所为的时候，我们必定确信，列宁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在列宁在世时还只露一点苗头，但在最近几年已经发展到严重地滥用职权的地步，这给我们党造成了难以形容的损害。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和正确分析这个问题，以便我们可以杜绝以任何形式重演斯大林生前发生过的事情的可能性。斯大林是绝对不允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的，因为他总是以粗暴蛮横的态度对待一切不顺从他的事情，对待不迁就他任性和专断的脾气而与他观点相反的意见。

斯大林的作风不是通过说服、解释而耐心地与人协作，而是把他的观点强加于人，要求绝对服从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的观点，或者试图辩明自己的观点和证明自己的立场正确的人，都注定要被调离领导班子，并随即在精神和肉体上被消灭掉。这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时期内有尤为确凿的事实，当时有许多忠心耿耿地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领导人和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专制主人的牺牲品。

我们必须肯定，党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进行了一场严重的斗争，从而在思想上解除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的武装。这场意识形态上的斗争进行得很成功，结果使党变得力量巩固，并受到了锻炼。斯大林在这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党领导了一场伟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反对自己队伍里那些抛出反列宁主义提纲、提出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为敌的政治路线的人。这是一场顽强而艰巨却又十分必要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要引向复辟资本主义和投降世界资产阶级。我们想一想，假若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右倾的政治路线在我们当中得势，或者把方针转向

“棉衣工业化”或转向富农等等，那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就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解除了武装而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软弱无力。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党领导了一场不屈不挠的意识形态斗争并且向全体党员和非党群众说明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提出反列宁主义建议的危害性和危险性。这一解释党的路线的伟大工作取得了成果，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政治上被孤立了，绝大多数党员支持列宁主义路线，使党得以唤醒和组织工人群众运用党的列宁主义路线去建设社会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进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人的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进程中，也没有对他们采取极端的镇压措施。这场斗争是在意识形态范围内进行的。但是几年以后，当社会主义在我国基本上建成，剥削阶级大体上被消灭，苏联的社会结构已根本改变，仇视党的政治运动和集团的社会基础已大大削弱，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对者在政治上早已破产的时候，却开始了对他们的镇压。

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九三五—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出现了通过政治机关实行的大规模镇压，起初反对的是列宁主义的敌人，即早已在政治上被党击败了的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随后便转为反对许许多多忠实的共产党员，甚至反对这样一些党的干部，他们原都是在内战中，在工业化和集体化初期最艰难的岁月里勇挑重担的人，都是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进行过积极斗争而捍卫了党的列宁主义路线的人。

斯大林创造了“人民的敌人”这一概念。有了这个词，一个人或一些人在争论时的意识形态上的错误就自动地无需再证实了，有了这个词，就有可能违反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而使用最残酷的镇压，来反对在任何方面与斯大林持不同意见的任何人，反对那

些仅被怀疑有敌对意图的人，反对那些具有坏名声的人。“人民的敌人”这个概念实际上消除了进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可能性，排除了使得一个人在这个或那问题甚至一些实质性问题表明自己观点的可能性。实际上采用的、与现行法学一切准则相违背的、唯一的主要罪证就是被告者本人的“供词”，而后来的调查证明，“供词”往往是通过通过对被告的肉体上的镇压获得的。

这就导致了公然地践踏革命法制，而使很多过去捍卫过党的路线的完全无辜的人成了牺牲品。

我们必须断言，对待那些当年反对过党的路线的人，也常常没有足够重要的理由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掉。“人民的敌人”这种公式化的提法，是专为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而提出的。

事实上，后来很多被当作党和人民的敌人而消灭的人，都是列宁生前的共事者。其中一些人在列宁在世时犯了一些错误，但尽管如此，列宁还是得力于他们的工作，因而他纠正了他们的错误，尽可能做到把他们留在党的队伍里，劝说他们跟他走。

在这方面应该让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知道弗·伊·列宁一九二〇年十月给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项没有发表的手谕。列宁在概述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时写道，监察委员会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的“党的和无产阶级良心的机关”。

作为监察委员会的特别任务是对待所谓反对派的代表要关怀和有区别，甚至时常象真正治病那样对待他们；他们由于在苏维埃或党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产生心理上的恐慌。应尽力安慰他们，同志式地给他们讲明情况，给他们安排(不是用命令方式)适合他们心理特点的工作，就此向中央组织局提出建议和指示等等。^①

^① 《列宁文稿》第3卷第275页。

每个人都知道，列宁是怎样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与背离党的正确路线的人势不两立的。但是同时，从已提供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列宁在指导党的实践中，要求党同那些犹豫不定或者和党的路线暂时不一致、但仍有可能回到党的道路上来的人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列宁告诫说，对这种人应该进行耐心教育，不要使用极端的办法。

列宁待人的智慧明显地表现在他与干部的工作中。

斯大林在与人的关系上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列宁的特点是：对人进行耐心的工作，顽强而费尽心心地教育他们；有能耐不使用强迫手段而宁肯通过整个集体对他们进行思想影响的方式，来诱导他们跟他走，而这些都是斯大林完全没有的。他〔斯大林〕丢掉了列宁主义说服和教育的方法；他抛弃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方法，而采用了行政暴力、大规模镇压和恐怖的方法。他愈来愈大规模地和更加固执地通过惩罚机关行事，同时常常违反一切现行的道德规范和苏维埃法律准则。

一个人的任意行事便助长和容许了另外一些人的为所欲为。大规模逮捕和成千上万人被放逐，以及不经审讯和正规调查而加以处决，使人处于不安全、恐惧、甚至绝望的境地。

这当然无助于党的队伍和劳动人民各阶层的团结，反而使一些忠实的、但斯大林觉得碍手碍脚的工作人员被消灭和被开除出党。

我们党曾为完成列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而斗争过。这是一场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只要我们在这一斗争过程中遵循列宁主义的原则，只要我们善于把党对原则的忠诚与对人的热情关怀结合起来，而这些人既没有被排斥和干掉又都吸收到我们这方面来了，那么我们就决不至于出现这种粗暴的、违反革命法制的情况，成千上万的人就不会沦为恐怖手段的牺牲品。我们就只是对那些

确实犯了反对苏维埃制度的罪行的人诉诸非常手段。

让我们来回忆一些历史事实吧。

在十月革命前的日子里，布尔什维克党的两名中央委员会委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宣称他们反对列宁提出的武装起义计划。加上十月十八日他们在孟什维克报纸《新生活》上发表一则声明，宣称布尔什维克正在准备起义，他们认为这是冒险行动。这样，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把中央委员会举行起义的决定，以及不久即将组织起义的情况泄露给了敌人。

这是一种反对党和反对革命的通敌行为。弗·伊·列宁曾就此事写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向罗将柯和克伦斯基泄露了自己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①他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的问题。

但是众所周知，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仍然给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领导地位。列宁把他们安排在执行最负责的党的任务和积极参加党和苏维埃领导机关工作的职位上。众所周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列宁在世时还犯有许多其他严重错误。列宁在其“遗嘱”中告诫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②但是列宁并没有提出逮捕他们，更没有提出枪毙他们的问题。

或者让我们举托洛茨基分子作例子吧。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以后，现在我们可以完全平心静气地谈论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并且可以充分客观地来分析这个问题了。托洛茨基周围有一批人，他们的出身无论如何毕竟不能追溯到资产阶级社会中去。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属于党的知识分子，一部分人则是从工人当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05页。

② 同上书，第36卷第817页。

中吸收来的。现在我们还能够叫出很多当时加入了托洛茨基一伙的人的名字；但是，就是这些人在革命前、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期间以及巩固这一最伟大革命的胜利时，积极地参加了工人运动。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与托洛茨基主义决裂了，回到了列宁主义的立场。难道有必要消灭这种人吗？我们深信，只要列宁还活着，就决不会对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

这只是几个历史事实而已。难道能够说，列宁在确属必要时也没有对革命的敌人果敢使用最严厉的手段吗？不能，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对革命的和工人阶级的敌人采取决不调和的态度，必要时毫不留情地诉诸这种手段。大家只消回忆一下弗·伊·列宁与组织反苏维埃暴动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以及与一九一八年反革命富农和其他人的斗争，当时列宁毫不犹豫地对敌人采取了最极端的措施。但是，列宁只是对真正的阶级敌人，而不是对那些犯有大小错误、能够通过思想影响来诱导、甚至能够保留领导职位的人采取这种措施。

列宁只是在最必要的情况下，在剥削阶级还存在而且激烈反对革命、生存斗争决定性地采取最尖锐的形式、甚至是一场内战的时候，才使用严厉的手段。

反之，斯大林是在革命已经取得胜利，苏维埃国家增强了实力，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关系已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确立起来，我们党已在政治上得到巩固并在人数上和思想上得到加强的时候，使用了极端手段和大规模镇压的。很明显，斯大林在一整串的事件上都表现出他的偏执、他的残忍和滥用职权。他不是政治上以身作则、动员群众，而是经常采取镇压和从肉体上消灭的方法，既对付那些真正的敌人，也对付那些对党和苏维埃政府没有任何犯罪行为的人。我们从中看到的不是智慧，而是曾经让弗·伊·列宁十分警惕的横蛮暴力的表现。